

訪問大陸名藏學專家陳慶英教授

——談藏學研究點滴

編輯室 / 採訪·整理

問：以何因緣，來台講學，講授哪些課程？有何感想？

答：首先，我願意儘量準確地回答你的問題，因為這幾個月在你們法光佛研所上這一門“藏文閱讀與翻譯”課，所以我應該有一點義務，讓選這門課的學生和法光月刊的讀者知道一些我的情況，講一些我的感想，增進互相的瞭解。

我這次來台是因為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宗教所所長劉國威博士的邀請，在他們所裏作一個學期的客座，上“西藏佛教”和“宗教文化”兩門課程，每週六個學時。他們學校是在宜蘭縣的礁溪鄉，所以當蕭金松老師請我來法光教課時，我怕交通不便，有些猶豫，後來因為劉國威博士也要來法光授課，他可以帶我來，所以才決定下來，堅持每週來教一次課。

我 1995 年在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教過一個學期的課程，上蒙藏關係史和藏文史籍概論，在大陸也接待過臺灣研究西藏的學者，因此對臺灣的藏學研究的情況還是知道一些的。最近這些年，臺灣研究西藏的學者到大陸去考察和參加學術會議的人比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少了，所以大陸藏學界有許多人議論說臺灣的藏學研究停頓了、衰落了。所以，經過這兩個月的實地教課和觀察，現在臺灣一些大學的宗教系的學生和對藏學研究有興趣的學者學習藏文的熱情和精神，使我感到意外和欣喜。確切地知道是臺灣的藏學研究主要地轉到宗教的大學和研究所來進行，而且在不斷地培養新的研究人才，有一些有志青年在刻苦努力地鑽研，這是最深的一點感想。

問：何種因緣使您決定要研究藏學？早期有什麼辛酸苦辣？

答：在大陸上，像我這樣的在 40 年代出生的人，在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即使有機會上大學，也很難對自己學什麼專業、將來要研究什麼學問作出決定。一方面是對大學的專業設置不瞭解，一方面是當時強調服從國家需要，分配去學什麼專業是不能不去的。所以大家並不能夠選擇

和決定自己的方向。我的祖籍是廣東臺山，是一個有名的僑鄉。抗日戰爭時我父親在南京讀大學，隨學校到了四川，我是在四川出生的，1958 年在讀高中時隨家庭到了青海。1958 年我考大學時，因為有親戚在海外，父親在舊社會讀過大學，本來是不大可能被大學錄取的，但是當時青海省在“大躍進”中突擊辦了幾所大學，而全省只有幾所中學有高中畢業生，所以我很幸運地進了大學，不過是被分配到學生們都不願意去讀的青海民族學院。當時還有些慶幸自己是上物理系，但是入學一年以後，我們的院長紮西旺徐（是 1935 年紅軍長征時在四川參加中共的藏族幹部）決定不管什麼專業都要用一半的時間學藏語藏文，理由是將來的畢業生都要到牧區去教書和工作，專業知識差一些不要緊，藏語文卻不能不學，而且要學好（我們系當時主要是學剛剛翻譯成藏文的初中物理課本，順帶學藏文的文法等，背了許多當時新造不久的藏文科技名詞，不久就因為用不上而忘記）。學校還安排各個系的學生到牧區去住在牧民的家裏學習藏語，我是在 1963 年春夏在青海湖邊上的牧民家裏學的。開始學生們（在理科專業的學生中大多數是漢族和家在城市的少數民族學生）對此都很抵制，但是看到青海的其他的大學都因為“大躍進”帶來的經濟困難而停辦，只有民族學院保留下來，又感到幸運。我父親在 1960 年從西寧市下放到湟中縣去工作，家也搬到湟中縣，所以我在 1962 年的正月就參觀過塔爾寺的法會，是 1958 年以後到文革結束期間唯一的一次，因為十世班禪大師參加，所以比較隆重，各地來的藏族農牧民信眾很多。當時我們刚开始學藏語文不久，就看到這樣一種不同的宗教文化的展示，在思想上引起的震動，可能和今天臺灣學習藏文的學生第一次到西藏的感覺差不多。由於這個原因，當時我是我們班上對學藏文比較感興趣的一個，我有一個土族同學完瑪巷秀，他的藏文比較好，我們買了一本格西曲劄藏文

詞典，還有能夠找到的藏文讀物，如《說不完的故事》、《格薩爾王傳》，在一起讀，學了一些藏族文化的基礎的知識。但是不久就開始“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這種學習也停下來了。總之，我開始學習藏語藏文，好像是有一種奇特的因緣，一種無形的力量在推動我去學習，但是不能深入進去學習，更談不上有明確的研究藏族文化或者藏傳佛教的目的，因此學習藏文是沒有長期計劃的，也沒有老師能夠給你明確的指點。這也正是我羨慕在我們後面的許多從青年時就開始學習藏文、有廣泛的學識基礎並能夠系統鑽研藏學的學生的原因。

問：可否談談您在中央民族學院藏學所的學習過程？

答：我大學畢業後到青海省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去當了十來年的中學教員，海西州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州，在柴達木盆地，有二十多萬平方公里，主要是戈壁灘和沙漠、鹽湖，只有二十多萬人口，從事畜牧業的蒙古族和藏族人口都只有兩三萬人，大多數是從各個省來的漢族工作人員，所以我們州中學的教員來自北京、上海、西安、蘭州的重點大學的畢業生比較多，我們從青海的大學畢業的是比較差的。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1978年，大陸恢復招收碩士研究生，我們學校的許多老師都去報名。我本來不想去考，因為我知道我們在物理學方面連一個普通師範學院的課程也沒有學完，不可能考上物理專業的研究生。在報名快要結束時，有一個我教過的學生在招生辦公室工作，他打電話說許多老師都去報名了，我為什麼沒有去，讓我去看招生的目錄。我到那裏剛好有人在翻看，說中央民族學院還要招古藏文專業的研究生，也不知道是學什麼，我心裏一動，就想不如考一下這個專業，雖然不可能考上，但是我當時剛好轉到民族師範學校教書，也可以藉這個機會復習一下藏文。報考研究生還要單位批准，我們的德欽校長是一個蒙古族，是民族學院畢業的，他說那麼多專門學藏文的人，全國就只招收幾個人，你不可能考上，不過可以照顧你，讓你去考，但是考完了就要安心教書。就這樣我參加了考試沒有想到的是，不久學校通知我到北京去復試，並在十月份錄取入學。

我們在中央民族學院是民族語文系（其中的藏語文教研室後來發展成藏學系和藏學所）的古藏文專業的研究生，學生有端智嘉、格桑益西、謝佐和我，老師卻很多，有格桑居冕、洛桑群覺、王堯、

佟錦華、耿予方等老師，學校還特地從西藏請回東噶·洛桑赤列老師給我們上課，講《智者喜筵》、《詩鏡論》、《土觀宗派源流》等，連續講了兩年。像東噶·洛桑赤列這樣的大學者給我們一個生詞一個生詞地作講解，使我們逐漸地進入歷史上許多藏族大學者在幾百上千年中才積累起來的一個知識寶庫中，確實是我們特別的福分，所以當時北京和藏學有關的各個單位的人員都來聽講，學校也是來者不拒，常常是一個大教室裏擠得滿滿的，我們幾個正式的學生反而沒有地方，只能坐在最後面。另外，中央民族學院民族學系的王輔仁老師的研究生阿沛·晉美、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王森先生的研究生祝啓源有時候也和我們一起上課，因此王輔仁老師給我們講藏族史和西藏佛教史，佟錦華、耿予方老師給我們講藏族文學史，洛桑群覺老師講西藏歷史地名，格桑居冕老師講藏文文法。而我的研究方向是敦煌古藏文文獻，是王堯老師給我一個人上課，所以常常就在他的家裏上。當時雖然是這些名師講課，但是物質條件卻很差，系裏只有兩台笨重的磁帶答錄機，只能上英語時借用，上其他課都是記筆記，課後再整理，王輔仁老師講的西藏佛教史，就是我和阿沛·晉美記錄整理以後1981年在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們還在這一期間去承德和敦煌、甘南、青海等地實習，是由這些老師帶著去的。當時使我深深地感到，學習藏文文獻確實需要到藏區各地去看看，才能學得進去。

在中央民族學院的三年學習期間，我和端智嘉住一間宿舍。他的藏文很好，是著名的藏族作家和學者，可惜1985年底35歲時就去世了，民族出版社前幾年給他出了文集，有六本之多，他如果能夠多活幾年，成果一定會更多。我從他那裏獲益良多，我後來能夠比較順暢地閱讀藏文古籍，與他那幾年的指點和幫助是分不開的。我們還合作把新舊唐書的吐蕃傳翻譯成了藏文，原來只是中央民族學院油印，沒有想到許多藏族老學者對此非常重視，在他們的推薦下，青海民族出版社在1984年就出了鉛印本，並重印過兩次。我們原來還計劃繼續翻譯宋史、元史、明史和清史稿裏的藏族史料，由於畢業後在不同的單位，聚不到一起而沒有實現。

1981年10月畢業後，我在中央民族學院藏學所工作了兩年多，當時正是胡耀邦去西藏視察和講話後不久，本來中央民族學院的藏學研究所受到上下各方的關注，但是它又是一個新建的小所，研究工

作不容易走上正軌，領導並不讓我去繼續研究敦煌藏文文獻，而派我去作編輯論文集、譯文集的工作，並幫助領導選編元代有關西藏的資料。我在那時主要是和王輔仁老師合作寫《蒙藏民族關係史略》，並為此組織翻譯《紅史》、《薩迦世系史》，集中作了一段薩迦派的藏漢文資料的整理工作，這時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的沈衛榮來中央民族學院聽課，通過他我又和元史研究會的一些先生有了交往，參加過他們的一些活動，這些都為後來寫《元朝帝師八思巴》打下了基礎。這樣堅持了兩年多以後，因為有許多困難，青海又來動員我回去，於是我就調回了青海，在青海社會科學院工作。

問：您在青海社會科學院做過一段時間的研究工作，當時是作哪些研究工作？

答：青海社會科學院是以研究青海地區為主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我們是從整理塔爾寺的藏文文獻開始工作的，開始的幾年，我們在湟中縣租了一些房子，每天到塔爾寺去，給各個活佛家的藏書編目，塔爾寺的阿嘉、色多、卻西、西納、米雅活佛院都有許多藏書，是歷輩活佛陸續購置或者刻印的，經過各種變遷，現在的這些活佛也不完全知道自己有哪些書，因此由我們來一本一本地把書名抄下來，作了將近三年，然後彙集成冊，給活佛一份，我們一份。這個專案是青海省少數民族古籍整理辦公室委託的專案，也得到當時的塔爾寺寺管會主任卻西活佛和阿嘉活佛的大力支持。趁這個機會我們對塔爾寺的歷史、佛像、經典、建築、碑刻、壁畫等進行了廣泛的收集，最後在 1987 年寫了一本《塔爾寺概況》，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對藏傳佛教的一座大寺院進行幾年的長時間研究，那時在大陸也是很少的，所以雖然這本書只有十幾萬字，卻是第一本全面介紹塔爾寺的書，對後來許多同類性質的書影響比較大。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對佑寧寺、隆務寺等青海的寺院也進行過一些研究。其次是我們在青海社會科學院裏建立了一個藏學研究所。我們分析了自己的長處和短處，認為青海和西藏、北京的藏學機構不同，只能集中力量做某個方面的工作，才能夠取得有價值的成績。我們選擇了將藏文典籍翻譯成漢文。我們知道這是一項需要長期努力並且不被上級重視的困難工作，學術界許多人也不知道藏文典籍漢譯的難度，所以許多有條件作的人也不願意在這裏耗費時間和精力。好在我們所裏當時集中了一批從青海民族學院、西北民族學院藏文系畢業的青年學

生，他們還沒有明確的發展方向，還願意作這項工作。我們翻譯了《漢藏史集》、《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三世四世達賴喇嘛傳》、《五世達賴喇嘛傳》、《六世班禪傳》、《夏瓊寺志》、《佑寧寺志》等，參加的人有蒲文成、許得存、卓永強、馬連龍、馬林、何峰、謝熱、敖紅等人，還和院外的一些學者合作翻譯。另外我們還作了一個比較大的課題，是列入中國社會科學基金資助的重點專案，就是研究青海藏族地區的社會組織，也就是農牧區的藏族部落制度，以及青海的藏傳佛教的寺院分佈，最後完成了《中國藏族部落》、《藏族部落制度研究》、《甘青藏傳佛教寺院》等書。我覺得在這個階段我們是按照自己的情況開展研究的，對藏學研究的發展起了一些作用，所以也引起省內外的關心藏學的學者的注意。

問：什麼時候轉到北京工作的？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您曾經擔任過哪些職務？推動哪些重要工作？

答：我是在 1993 年調到北京的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工作的，因為當時藏學研究中心的總幹事多吉才旦先生多次動員我去他那裏工作，並且和青海方面聯繫好，所以我又轉到北京，當時是擔任歷史宗教研究所的所長，到 2000 年分成歷史研究所和宗教研究所，我擔任歷史研究所的所長。藏學研究中心成立於 1986 年，研究人員大部分是 80 年代後期從各個學校畢業的碩士生和博士生，所以我們是一邊物色人員，一邊進行培養，一邊開展研究，是籌建研究所的階段。作為所長，我主要負責實際組織“元以來西藏地方和中央關係史”和“藏傳佛教寺院調查”這兩個主要的課題，同時也注意如“西藏梵文寫經編目”和“藏傳佛教藝術史”等選題的進展。此外還有組織所內的科研人員到國外進行學術交流、到西藏考察等。所以，很單純地由自己一個人進行的研究課題就比較少了。在藏漢翻譯方面，最近這些年主要是參加了翻譯恰白·次旦平措等先生編寫的《西藏通史—松石寶串》的工作，這部譯稿最近還做了一次修訂，即將再版。在藏學研究中心工作還有一個好處是和海外的藏學界的學者交流比青海多一些，我這些年也到臺灣、美國、泰國進行講學或訪問。雖然次數不很多，但是對我瞭解海外學者的研究情況卻很重要。

問：可否簡單描述一下您在藏族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一路走來最大的成功因素是什麼？給後輩學者有什麼建議？

答：從上面所說的，其實您可以看

出，我作藏學研究並不是有明確的方向和計劃的，是跌跌撞撞地走過來的，我對自己的研究成果是不是重要，並不太清楚。起碼在開始的時候是不清楚的，只是在研究的過程中慢慢發現一些新的東西。在藏族史研究方面，我其實只是把一些已經有的論述去和藏文的古籍比較，加上向藏族學者請教，結合自己在藏族蒙古族地區生活的體會，從這裏找藏文有記載而漢文史料中沒有的，再看這些記載能夠說明什麼問題。在吐蕃王朝歷史方面，我提出吐蕃王朝的主體是雅魯藏布江流域的農業地區，而不是許多人認為的遊牧地區，吐蕃王室和臣下的君臣關係是穩固的，吐蕃的職官制度可以分析為三個系統（內相、外相、整事），而總於宰相。在元代藏族史方面，我對八思巴這個歷史人物的一生的活動進行了整理，根據他的文集中篇末的題記，分析他每年在什麼地方，列出他的年譜，最後寫出一本介紹他的書。通過對他的研究，對薩迦教派和款氏家族的認識也逐步加深了。這些研究有時候會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薩迦寺珍藏有一套繪製於明代的“八思巴唐卡”，有二十多幅，他們整理不出前後順序來，後來是利用了我們的研究成果才解決問題，出版了一部大型的畫冊。最近這些年，我根據在臺灣出版的《大乘要道密集》的題款，判斷出其中有許多篇是在西夏王朝時期翻譯成漢文的，從而對西夏的佛教以及藏傳佛教（主要是薩迦派和噶瑪噶舉派）在西夏的活動找到了重要的線索，受到大家的重視。我覺得藏學研究越往深入發展，就越需要研究者有廣泛的知識，同時也要有對西藏歷史文化的深入認識，藏學還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我們所作的工作中錯誤的或者不全面的也很多，希望後來的學者繼續努力。

問：您的翻譯作品很多，特別是西藏史籍和達賴喇嘛等人的傳記方面，信達雅兼備，深受讀者喜歡，您是怎樣辦到的？請談談您的經驗，供大家分享。

答：謝謝您對我們的工作的肯定和表揚，其實我們的許多翻譯也是趕出來，質量不一定很好。因為我們是為了解研究問題而翻譯的，所以在翻譯的時候盡可能閱讀了相關的材料，努力作一些注釋，以便利讀者利用這些資料。另外我們有一個比較好的條件是隨時可以向藏族的學者和研究藏學的專家請教，書中提到的地方和寺院，有的我們自己去過，便於我們理解作者在說什麼內容。現在資訊比以前便利，許多資料和圖檔可以在因特網上找到，要

從事藏漢翻譯的學者，可以隨時關心這些資料，注意隨時整理，在工作的時候就比較容易查閱。我的經驗是在開始翻譯時最好能夠藏族學者和漢族學者結合起來翻譯，遇到難題互相討論，有時甚至會爭辯，但是這樣解決問題以後，就會印象深刻。許多藏漢大詞典上查不到的東西，只能由學者的討論來解決，或者只好暫時存疑。我想新一代的年輕的翻譯者會比我們做得好一些，對藏漢之間的文化交流會更好地起到橋梁的作用。

問：這次您在法光佛研所開設“藏文閱讀與翻譯”課程，相當叫座，可否簡單介紹一下課程內容和訓練目標？在漢藏翻譯訓練方面，應該具備哪些因素？注意哪些問題？

答：這次在法光佛研所開設“藏文閱讀與翻譯”課程，是來臺北後才決定的，沒有很好準備，所以只好選了一本介紹西藏歷史文化的藏文書作教材，結合課文講藏文的歷史文化，因為是用漢語講，自然也就是要把這些內容翻譯成漢文。這實際上就是領著大家來讀藏文書，課文中遇到什麼問題就講什麼問題。好在來聽課的同學許多人已經在法光佛研所學過一段藏文，對藏傳佛教和西藏的歷史文化也有一些基礎，所以在聽課時會覺得有興趣，老師和學生容易溝通。另外在上課時結合一些圖片和歷史典故等，也能夠加深學生的理解。我覺得這個課程能夠上得比較好，最主要還是來聽課的同學有這方面的發心，有的人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為了聽兩個小時的課程，長途奔波，精神使我感動。

問：大陸學者在“藏文名著漢譯”方面的具體成就有哪些？還有待發展的是哪些？

答：在上個世紀 80 年代，大陸的學者翻譯了一批藏文古籍，還有郭和卿、劉立千等老一輩的學者的譯作，多數是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當時叫“西藏歷史文庫”，最近他們又重新印刷，在臺灣也買得到。各個地區也出版了一些翻譯作品，如甘肅青海出版的《安多政教史》、《塔爾寺志》、《至尊宗喀巴大師傳》、《如意寶樹史》等。90 年代以後還分散出版過一些，總數可能有幾十種，在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藏學新書目錄》（有三個分冊，大陸 80 年代以來出版的藏學書籍差不多都收進了）上可以查得到。還有一些譯作最近要出版，如黃顯先生翻譯的《智者喜筵》。大陸的學者近年來也開始注意藏傳佛教的一些經論的翻譯，有些是和海外的

學者合作進行的。

問：您對於臺灣藏學研究藏文教學或者兩岸學術交流合作上有什麼建議？

答：我覺得臺灣的藏學研究和藏文教學是有比較深厚的基礎的，而且和大陸的藏學界相比，有自己的長處。雖然在進藏考察、人文歷史等方面，條件不如大陸，但是對藏傳佛教的經典和教理的研究方面，臺灣的學者有自己的優勢。這些年藏傳佛教在臺灣有了比較大的發展，社會上關心藏傳佛教的人增加了許多，研究藏傳佛教的需要是始終存在的。臺灣研究藏傳佛教的學者或者本人就是出家眾，或者是對佛教有很深的信仰，這是與大陸許多研究藏傳佛教的學者不同的，所以能夠取得有自己的特點的研究成果。我想兩岸藏學界的學術交流還是要保持下去的，可能人員來往比 90 年代時少了一些，但是通過成果的交流也可以互相瞭解，或者進行合作。在藏文經典翻譯方面，實際上的合作一直在進行。我想法光佛研所在開展藏文教學方面，可以利用大陸的一些教學資料，如課本、光碟，加強形象化教學，效果會更好。

陳慶英老師簡歷與作品

學歷

1960 年 7 月，青海省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畢業。1965 年 7 月，青海師範學院物理系畢業。1981 年 10 月，中央民族學院民族語文系古藏文專業畢業，獲文學碩士學位。

著作目錄

《吐蕃贊普赤德松贊略傳》(藏文)，與端智嘉合寫，民族出版社 1984 年 4 月出版。

《蒙藏民族關係史略》，與王輔仁合寫，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5 年 10 月出版。

《塔爾寺概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1 月出版。

主編《中國藏族部落》，中國藏學出版社 1991 年 6 月出版。

主編《藏族部落制度研究》，中國藏學出版社 1995 年 9 月出版。

《元朝帝師八思巴》，中國藏學出版社 1992 年 6 月出版。

《青海藏傳佛教寺院碑刻譯釋》，與馬林合寫，蘭州古籍書店作為西北文獻叢書之一於 1992 年出版。

《西藏地方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歷史資料選編)》，參加編選，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中國各民族宗教與神話大詞典》，參加編寫詞條，學苑出版社，1990 年出版。

《藏族傳統文化辭典》，任副主編，甘肅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阿古頓巴的故事》，蒙藏兒童讀物叢書之一，蒙藏委員會 1997 年出版。

《西藏歷史文化辭典》，任主編之一，該書 1997 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和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翻譯作品目錄

漢譯藏：

《吐蕃傳》，與端智嘉合譯，青海民族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藏譯漢：

《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民族出版社 1985 年 7 月出版。

《王統世系明鑒》，與仁慶紮西合譯，遼寧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1 月出版。

《漢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2 月出版。

《紅史》，與周潤年合譯，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與馬連龍合譯，民族出版社 1988 年 4 月出版。

《薩迦世系史》，與周潤年、高禾夫合譯，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蒙古佛教史》，與烏力吉合譯，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三世達賴喇嘛傳、四世達賴喇嘛傳》，與馬連龍合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1992 年出版。

《西藏通史》，與何宗英、格桑益西等合譯，西藏古籍出版社、《中國西藏》雜誌社 1996 年出版。

《五世達賴喇嘛傳》(上中下三冊)，與馬連龍、馬林合譯，中國藏學出版社 1997 年出版。

英譯漢：

《本教歷史及教義概述》，與向紅筍合譯，中央民族學院藏族研究所編《國外藏族研究譯文集》，第 1 集，1982 年。

《大司徒絳曲堅贊(1302—1364?)的生平和政治活動》，四川民族研究所編《國外藏學動態》，第 6 集，1992 年。

《評拉堆絳(家族)世系》，《甘肅民族研究》，1992 年 2—3 期合刊。

論文目錄

《斯坦因、伯希和敦煌漢文寫卷中夾存的藏文寫卷情況調查》，蘭州大學《敦煌學輯刊》第二輯，1981 年。

《試論贊普王權與吐蕃官制》，《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2 年第 4 期。

《元朝在西藏所封的白蘭王》，《西藏研究》1983年第4期。

《元朝帝師八思巴年譜》，《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4期。

《八思巴評傳》，與王輔仁合寫，《中國民族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元代烏思藏薩迦政權及其與蒙古皇室的關係》，《青海社會科學》1986年第3期。

《塔爾寺楹聯上的八思巴字》，《西藏研究》1986年第3期。

《八思巴致元世祖忽必烈的新年吉祥祝辭探討》，《甘肅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1987年1—2期合刊。

《江孜法王的家族與白居寺的興建》，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薩藏學討論會文選》，1987年。

《章嘉·若必多吉與乾隆皇帝》，《中國藏學》1988年第1期。

《九世班禪額爾德尼駐錫塔爾寺記事碑譯釋》，《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噶瑪巴·攘迥多吉兩次進京事略》，《中國藏學》1988年第3期。

《香山昭廟乾隆禦制碑考釋》，與王文靜合寫，《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88年第4期。

《夏魯的元朝帝師法旨》，《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8年第4期、1989年第1期。

《章嘉·若必多吉年譜》，《青海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

《元代烏思藏本欽紀略》，中華書局《元史論叢》，第4輯，1989年。

《元代薩迦本欽辨析》，西藏人民出版社《藏學研究論叢》第2輯，1990年。

《元朝帝師制度及其歷任帝師》，《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91年第1期、第2期。

《從帳簿文書看吐蕃王朝的經濟制度》，《中國藏學》1992年特刊。

《西夏語同藏語辭彙之比較》，《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4期。

《蒙藏的早期交往及西夏在蒙藏關係中的地位和作用》，《青海社會科學》1992年第6期。

《西夏與藏族的歷史、文化、宗教關係初探》，西藏人民出版社《藏學研究論叢》第5輯，1993年。

《五世達賴喇嘛與第巴桑結嘉措關係探討》，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六十八，臺灣蒙藏委員會，1996年。

《關於元代西藏的戶籍清查》，《海峽兩岸中國少數民族研究與教學研討會文集》1996年。

《五世達賴喇嘛與印度文化》，《西藏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

《西藏首次遣使清朝史實探討》，《中國藏學》1998年第2期。

《弘宣佛法與記錄人生—略說藏傳佛教傳記文學作品》，收入臺灣法鼓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佛學與文學》，1998年。

